

为企业减负 稳增长才有后劲

本报评论员

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稳增长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近期，决策层在促投资、扩内需、稳出口等方面动作频频，力度非凡。这些举措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但毋庸讳言，目前的稳增长措施仍有不足之处，税收政策就是其中的一个扶助。

经济繁荣的年份适当多征税，经济不景气的年份尽量少征税，这是现代国家税收政策的一般规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困难，除了垄断型企业外，少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外，众多企业生存状态不佳，在这种情况下，给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减免税收，就显得很有必要。

如果说，用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创下34个月新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创下9个月新低等数据来描述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有些抽象，那么，从近期三一重工、华锐风电、比亚迪等知名小企业掀起的“裁员潮”，东莞多家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温州民企因用工成本上涨而不愿招工等具体事件中，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寒意。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社保卡“霸王条款”背后的权力滥用

付建利

社保卡本是造福于民众的福利卡，但一经权力的滥用，立马就变成了“霸王条款”社保卡。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社保卡内余额低于4595元不能在药店买药的规定引起舆论强烈关注。而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这个数字在2010年还是3621元，而自2012年7月1日起，就猛增至4595元。看来，当地老百姓工资的增幅也未赶上物价涨幅，社保卡在药店买药的最低余额却超过消费者物价指数了。

老百姓愤恨不平，说这简直就是霸王条款，社保卡里的钱本来是咱自己的，凭什么社保局要横插一杠子？深圳市社保局对此表示，设余额限制是为了保障参保人的门诊治疗需求，如果不设最低限额，当个人账户用于非门诊治疗的其他支出无费用可支付时，会影响参保人的门诊治疗。社保部门还说，凭处方买药无余额限制，而社保卡个人账户非随意支配的储蓄账户，恶意刷卡有损公平。

好一个要市民区分主次的“谆谆教导”！现实的情况是，深圳市社保卡在药店买药的门槛越来越高，不仅对参保人是一大利空，尤其是对于刚参加工作或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的社保卡上的余额可能五六年都积累不到4595元，一旦生病，他们只能到院去排队、挂号、诊断，不仅费时费力，也增加了医院门诊的压力，浪费了有限的公共资源。本来可以在药店买的常用药，非得因为4595元这一最低余额而上医院，

驱散寒意的办法有多种，比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公共事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等，但这些措施固然有用，都终究不能取代直接给企业减免税负。打一个比方，对一个体力不济的挑山工而言，与其让他吃补药，还不如减轻他肩头的重担，后者更有利于挑山工健康持久的劳动。

参照国际情况公正地看，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偏高，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太相称。过去10多年，中国财政收入（其主要来源是税收）与居民收入的两倍和三倍左右。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在经济高速增长从而矛盾被掩盖的局面下尚可勉强维持，但在经济增速下滑从而矛盾凸显的局面下必然难以为继。过去，在路径依赖的惯性支配下，中国错过了主动改革税收政策、降低企业税负的好时机，而今，严峻的现实敦促中国必须在降低企业税负方面切实有所作为。

应该承认，政府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目前正在试点并扩围的“营改增”就是一例，企业的税负因此有所减轻。但对照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困境看，这些减税的措施还不够给力。通

政府部门一直以来着力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可能愈演愈烈。

而管理部门口中“公平”，到底何意？按理说，社保卡上的钱属于参保人自己的钱，该怎么使用，老百姓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如果说老百姓对贪脏枉法、强取豪夺、滥用职权、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表哥”现象说“不”的话，对于管理部门随意剥夺自己财产的处置权，也不能说一个“不”吗？这种起码的消费自由权都被权力剥夺的话，请问公平又何在？

深圳市社保局还曾对媒体表示，在药店购买非处方药，是用于门诊治疗的辅助手段，市民要区分主次，深圳市综合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及相关模式符合城市特点，且整个制度行之有效，暂无更改的意向。

为何凭处方买药就没有余额限制？一纸处方为何有如此魔力？实际上，人为设置一个4595元，强迫消费者去医院或社康中心买药，不免让人生疑，这不是一种变相的帮医疗机构垄断客源？中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利益关联？

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社保卡的使用，应该由公民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由权力部门拍脑袋定一个数字。如果哪怕是一张社保卡的使用公众都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力，试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公民又有多少权利可言？政府部门权力的任意扩张，是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如此一张一弛，我们对公民社会的怀想，又到哪里去寻找？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胀增速虽下降但依然是正增长，用工、用电、用地成本高企，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经济转型需要缓冲期……企业所承担的这些沉重的压力，的确需要通过较大力度的税负减免来纾缓。

为企业减免税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至少有这几个方面：其一，有利于企业休养生息，降低经营成本，度过时艰。其二，有利于缓解企业裁员压力，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就业是提振消费的根本动力，而维系这一动力必须以广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为前提。其三，对比选择性地出口退税以及财政补贴，集体减税政策更加公平透明，既尊重市场机制，又遏制了权力寻租，还能避免给予外国政府对中国出口商品以“双反”制裁的口实。

当然，为企业减免税负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短期内有所减少，但这也倒逼政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进而言之，它还有可能倒逼政府精简机构，克制自己过分干预经济的那只“闲不住”的手，向现代化有限政府的方向转型。

因此，无论是从当下稳增长着眼，还是从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考量，改革税收政策为企业减负都是一步值得下的好棋。

遗憾的是，过惯了财政丰盈好日子各级政府依然有维持税收高增长的冲动。对于结构性减税，决策层依然心存顾虑，推行得不够果断，也不够坚决。而且，对于结构性减税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优化税收结构还是给企业和居民减负，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种政策上的暧昧，不仅使得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正能量大打折扣，也导致它在一些地方的执行中异化成结构性加税。

据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担心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完不成征税任

务，全国有十几个省市大搞“突击征税”运动，把名义上减税、实质上加税的手段运用得登峰造极，蹲点征税、提前征税、任务到人、立军令状……如此等等，让征税人员疲于奔命，也让企业苦不堪言。一边是多位高层领导在公开场合强调不要征收“过头税”，一边是下级税务部门“突击征税”给企业施压，如此怪象，的确令人感叹。这也说明，领导人的讲话是靠不住的，建设一套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包括税改机制）迫在眉睫。

建设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的前提是要有共识，而目前看来，这一共识的达成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最新的挑战有国内外两个事件。国内的是，根据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8月份中国财政收入增幅也低至4.2%，中央财政收入更是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6.7%。国外的是，为应对经济复苏乏力的窘境，法国政府刚刚宣布一项额度为200亿欧元的增税计划。两者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部门拒绝实质性减税的理由。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经济形势严峻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甚至负增长，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中国政府应该学会从容地接受它，继而理性地予以应对。而对于法国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逆势加税，我们要看到几点：首先，法国此次征税针对的是年收入在100万欧元以上的富人，而非针对企业；其次，法国政府债台高筑，资产负债表没有中国健康，应对经济困局的手段相对有限；最后，法国的做法是一种个案尝试，在世界范围内不是主流，而且其最终效果有待观察。

在税收问题上多做减法，少做加法。这一点，在中国当下尤其有必要，即使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也不会过时。仔细想想，涵养税源的辩证法、科学发展的执政观以及有限政府的理念，莫不尽在其中。



国务院研究确定促进外贸增长措施

促进外贸稳增长，决策部门费思量。小微企业多呵护，布局优化要跟上。出口退税应妥善，贸易摩擦莫紧张。比较优势依旧在，做好外贸大文章。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人民币流动性温和改善

陈伟

8月数据表明信贷增速有所改善，8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039亿元，环比增加1638亿元，同比也多增1555亿元，这表明当前市场担心的经济下滑期银行惜贷现象并不突出，在稳增长政策的努力下，今年剩下的4个月银行信贷仍能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从而支持经济复苏。

8月信贷增加的形势在好转。从贷款种类来看，中长期贷款更为突出，8月新增1657亿元，环比增加477亿元，而这也是2011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当前随着房地产市场复苏进程的加快，银行加大房贷投放及居民贷款购房的热情都在提高；企业部门新增贷款也有所提高，环比上月增加653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更为明显，环比增加547亿元，中长期贷款也改变了7月低迷的态势，环比增加283亿元。

8月贷款的增加也持续推动了社会

融资规模的持续扩大，8月达到1.24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多1885亿元和1666亿元，而其中除了贷款新增对于社会融资总量贡献较大外，债券融资也增长显著，8月企业净融资为2584亿元，同比多1686亿元，这一方面与有关部门为缓解实体经济资金紧张而放松了企业债券融资条件有关，如银行交易商协会下半年以来已经允许更多地区的城投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另一方面也与债券融资相对于贷款成本更低，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债券融资。

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贷款及社会融资总量有望持续好转。首先，居民贷款方面，随着房地产金九银十的到来，房地产销量的持续好转将会继续带动住房贷款保持稳定增长；其次，今年上半年地方融资平台较严格的财务限制限制了商业银行对于中长期的贷款投放力度，而下半年随着土地收入大规模入账带来的融资平台公司财务状况的好转，

银行对于基建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也将加大，如建行就明确表示下半年的信贷投放将从上半年的重点支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转向支持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建设项目；此外，政府部门为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还会进一步放开城投债的发行门槛，发改委将会允许非百强县发行城投债，并考虑推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私募债等。

尽管以上因素决定下半年流动性持续好转可能性大，但是我们也难以期待流动性出现较大幅度的好转。

首先，今年7月以来，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方面已经不如前期宽松，央行在银行间市场资金面较紧张时期，迟迟不下调存准而改用逆回购手段来缓解市场资金紧张状况，而这也使得7、8月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逐渐提高；8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84%，比上月高0.06个百分点，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央行担心潜在的通胀风险，如今央行的判断已经

在变为现实，如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已企稳反弹，这将促使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会更加谨慎，继续降准和降息刺激信贷的可能性都会减少，信贷明显增加也不大可能，而企业债券融资受市场利率水平的提高也会有所抑制。

其次，当前虽然政府层面稳增长力度加快，但是这些政策的奏效也需要较长时间，如今年下半年以来陆续批准的近上万亿基建投资项目实施时间都较长，因此它们对于目前普遍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的许多投资品行业来说，拉动作用短期也会比较有限，企业去库存化也就要经历更长时间，它们对于贷款的需求也就比较有限。

此外，虽然8月后，受出口形势好转及外围金融市场好转影响，人民币上半年贬值的趋势将会有所改变，外汇占款也有望增多，但是受制于海外及中国经济的弱势复苏态势，海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的意愿仍将难以有明显提高。

（作者单位：民族证券）

信贷资产证券化 应成为常态管理工具

王勇

国家开发银行于9月7日集中配售101.6亿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这是中国自2005年开始资产证券化以来资金规模最大的单。业内人士分析，这次信贷资产证券化采用的“出表”模式可有效缓解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压力，且有助于商业银行调整信贷存量结构。笔者认为，将来，随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施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应成为商业银行常态的资产管理工具。

试点基础资产种类扩大

今年5月17日，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此次仅首期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额度就达500亿元，且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经济清理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等均被纳入基础资产池。由此可见，此轮试点的基础资产种类进一步扩大，尤其是经济清理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也被纳入鼓励范围，从而为平台贷款的风险化解开辟了一条新路。另外值得欣喜的是，监管层在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同时，增加了“风险自担”的审慎性安排，要求银行购买5%的低收益分层结构产品，以实现内生信用增级。而国开行于9月7日集中配售的ABS，就是积极响应《通知》精神、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后首单发行的ABS。这单产品名称为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法定到期日为2018年1月12日，划分为三个层次：优先A档、优先B档、次级档证券。分别为80.68亿元AAA评级的优先A档、12亿元AA评级的优先B档、8.9844亿元BBB评级的次级档证券。本期产品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池涉及43名借款人向发起机构借用的49笔贷款，全部信贷资产均为浮动计息、按季度付息，且均为正常类贷款。信贷资产支持债券资产池优良，入池资产加权平均信用等级为AA。同时，根据国开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管理办法，资产风险相应完全转移给投资人，一旦发起银行破产，已出售资产不列入清偿范围，同样，被出售的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也不由发起银行承担。

证券化应成常态 资产管理工具

首先，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打通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与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通道，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进而构建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因此，商业银行应学会将信贷资产证券化变成常态资产管理工具，以便优化资产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运作质量。

其次，过度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也可能降低银行贷款审查的激励，模糊自营和代客业务之间的界限，使得银行不再坚持“客户为本”的理念。因此，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还需谨慎推进，应根据自身经营管理技术和风控能力的具体情况逐步由浅化走向深化，在当前情况下尤其是要严格控制不良资产和没有稳定现金流资产的证券化。

其三，要关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最首要的是可证券化基础资产质量风险。可证券化的资产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可能导致证券化一开始就存在风险隐患；还包括与SPV有关的风险。SPV是证券化交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PV必须实现基础资产与发起人及其自身的“破产隔离”，否则，商业银行、SPV以及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得不到保证。

另外，眼下，银行监管当局根据发起银行是否对被转让的资产保留了实际控制、是否承担其他角色、是否提供隐性支持的角度对银行资本计提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且商业银行在严格的资本监管下，被要求根据“证券化风险暴露”来计提资本，使得银行必须确保信贷资产证券化流程的每一环节以及相关资产管理工作都必须严格缜密。同时，鉴于当前参与主体的迅速增加，ABS发行认购的竞争或白热化，很多公司在发行阶段纷纷压低收费标准，这给业务的开展和公司的盈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应由监管部门指导出台关于该业务的收费标准，以规范ABS的发行价格、业务标准和准入政策。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高级培训师）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pll18@126.com。